



主编 乌云毕力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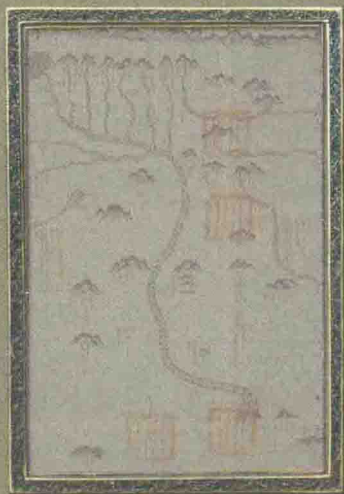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蒙古学编·卷三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

蒙古诸部族与 蒙古文文献研究

〔日〕森川哲雄 著

白玉双 译



内蒙古出版集团

民出版社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蒙古学编·卷三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

主编 乌云毕力格

蒙古诸部族与蒙古文献研究

〔日本〕森川哲雄 著

白玉双 译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诸部族与蒙古文文献研究/(日)森川哲雄著;
白玉双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4. 1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 蒙古学编)
ISBN 978-7-204-12746-7

I. ①蒙… II. ①森… ②白… III. ①蒙古族—编年
史—研究—中国—17 世纪 ②蒙古语—古文学—研究—中
国—17 世纪 IV. ①K281.2 ②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0774 号

蒙古诸部族与蒙古文文献研究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蒙古学编(卷三)

-
- 主 编 乌云毕力格
作 者 (日)森川哲雄
责任编辑 樊志强
封面设计 江晓辉 哈斯毕力格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2746-7/K·633
定 价 30.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 4971562

汉译说明

一、本论文集包括森川哲雄先生九篇专题论文。在内容编排时分为两部分，即前半部分主要是研究蒙古诸部族及其社会组织的论文，后半部分主要是研究蒙古文文献的论文。论文先后顺序，基本上以其写作时间为依据。

二、[]中的加写和（）中解释性文字均为原文所有。

三、为了如实地再现原文原貌，译文中将原文中的拉丁文转写全部予以保留，对一些重复的和不一致的转写也予以保留。

四、本论文集集中的九篇文章是森川哲雄先生三十年间先后完成的成果，很多专用名词互不统一。所以，在翻译时力求统一，尽量采用学术界约定俗成的用字。

五、在翻译原文中的部分引文时，参照了相关前人研究成果，即《蒙古源流》库伦本引文汉译参照了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佚名《黄金史纲》引文汉译参照了朱风、贾敬颜《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大黄史》引文汉译参照了乌力吉图校勘《古代蒙古汗统大黄史》（民族出版社，1983年）；罗藏丹津《黄金史》引文汉译参照了札奇斯钦译注《蒙古黄金史译注》（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元朝秘史》引文汉译参照了阿尔达扎布译注《新译〈蒙古秘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阿萨拉克齐史》引文汉译参照了乌云毕力格著《〈阿萨喇克其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特此说明。另外，在翻译蒙、汉、英、

俄各种文字引文时，尽量与原文进行核对。

六、在译文中，将原文的参考书目汇总介绍，以免重复。

说起翻译此书，则要衷心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乌云毕力格教授。2008年，先生将此重任交给我完成。我当时以为这是我继续学习深造明代蒙古社会制度和蒙古历史文献以及进一步了解日本蒙古史研究概况的绝好机会，就欣然接受了这个重任。但在真正着手翻译时才发现自己的知识多么匮乏、功底多么薄弱。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和再三修改，终于完成了此稿。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错漏之处难免，敬请诸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在翻译和修改过程中，内蒙古大学王雄教授、希都日古教授能够通读全文，给予润色和纠正错误，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在此深表谢意。内蒙古大学宝音特古斯博士、巴根那博士和宏英博士也给予了很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还要感谢内蒙古师范大学郭永胜教授、丁晓杰教授在外文文献和疑难语句的翻译上给予的帮助。特别要感谢内蒙古师范大学张建军教授，能够在书稿完成的时候通读全文，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

白玉双

二〇一二年十月

目 录

汉译说明	(1)
关于中期蒙古的万户——特别通过与兀鲁思的关系	(1)
关于喀尔喀万户及其建立	(30)
鄂尔多斯十二鄂托克考	(55)
关于察哈尔八鄂托克及其分封	(81)
土默特十二鄂托克考	(113)
萨冈彻辰与《蒙古源流》的编纂	(139)
关于《黄金史》的抄本及其成书年代	(170)
关于 17 世纪至 18 世纪初蒙古编年史 —— 特别是围绕 《蒙古源流》与《大黄史》的关系问题	(182)
成吉思汗家族系谱与《蒙古源流》	(211)
《蒙古源流》研究史	(233)
附录: 森川哲雄先生简历及其著述概况	(284)
参考书目	(291)
后记	(321)

关于中期蒙古的万户

——特别通过与兀鲁思的关系

1. 前言

到 14 世纪后半叶，由于汉族王朝明朝的勃兴，元朝的蒙古统治者被逐出中原，回到了蒙古故地。从此开始，直到蒙古被满族统治的 17 世纪中叶为止的约 300 年间，是蒙古民族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政治时期。此时的蒙古民族，虽然其势力已进入衰退期，并已失去了昔日君临欧亚大陆的风貌，但对当时的周边诸国所带来的影响却不小。当然，在此时的蒙古社会所出现的种种社会集团，是前代遗留下来的遗产，同时还被下一个时代所继承下去。因此，要解释清楚这个时期出现的社会集团的性质，在蒙古史研究中是不可避免的课题，并对欧亚游牧民族的社会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过去有关蒙古民族社会制度的研究不少，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符拉基米尔佐夫所著《蒙古社会制度史——蒙古的游牧封建制》（符拉基米尔佐夫，1934）。众所周知，符拉基米尔佐夫将蒙古的社会制度分为古代、中期、近代三个阶段，并在所谓的游牧封建制的框架中进行阐述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未能完成近代蒙古社会制度的部分就去世了。

该书被公开后立刻在日本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久就完成了其日译本，这对其后的蒙古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山田信夫，1970，p.54）。以符拉基米尔佐夫的研究为基础，一方面蒙古

社会史的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很多批判。但是，那些批判多见于符拉基米尔佐夫所说的古代，即从蒙古族的勃兴期到蒙古帝国时代，而对中期^①与近代，即所谓的明代蒙古与清朝统治下的蒙古社会的批判并不多见。确切地说，有关中期蒙古社会的研究很多只是停留在概述上，那也是几乎都原封不动地因袭了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观点而已^②。

符拉基米尔佐夫在其研究中，将中期蒙古社会比喻为封建制度的兴盛时期，并认为，这个时期虽有以游牧为基本生产方式的特殊条件，但在那里产生了典型的封建社会。关于这个问题，他通过这个时期的经济关系、诸多社会集团或宗教集团，及其所属的具有各种称号的人们的相互关系，加以其他分析巧妙地进行了说明。

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观点的确很精辟，也有很多别人无法突破之处。但是，他的观点果真是我们可以原封不动地因袭那样的完美吗？幸而我们拥有比他所处的时代更为丰富的史料，能够进行各种对比。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观点还存在很多问题。至少从中期蒙古社会的研究来看，我们发现他的观点不仅有些粗略，而且还有很多错误。其一就是有关这个时期社会集团的性质问题。在记载这个时期的蒙古编年史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社会集团，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万户（tümen）、兀鲁思（ulus）与鄂托克（otoy）。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其中的鄂托克相当于前代的千户（mingyan），是这个时期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并对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实际上，鄂托克这一集团

① 符拉基米尔佐夫将这个时期作为“古代”（Древний период，9～13世纪）与“近代”（Новый период，18～20世纪初）之间的时期称作“中期”（Средний период，14～17世纪），这里采用了该称呼，但这并不是指所谓“中世”的称呼。

② 这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史》（茹科夫.1967）第四章第一节“14～17世纪蒙古的社会制度”。在日本也有田山茂（1954年；1967年）试做了一些概述，但除了一部分内容之外，其余只是概括了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观点而已。

是这个时期初次在蒙古出现的集团，因此，它肯定是最能体现中期蒙古社会特征的集团之一。而万户则是从前代遗留下来的制度，符拉基米尔佐夫对万户的研究也只停留在了简单的说明上。但是，如下所述，这个时期的万户具有这个时期特有的性质，反过来说，万户是体现中期蒙古社会特征的重要要素之一。因此，在中期蒙古研究中我们决不可忽视万户的存在。

本文想对符拉基米尔佐夫有关中期蒙古万户的观点进行探讨，并研究中期蒙古万户的特征。

2. 过去有关中期蒙古万户的看法

在有关中期蒙古社会万户的研究方面，与其说前面所举的符拉基米尔佐夫的研究是代表性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唯一的研究。因此，本文首先要揭示符拉基米尔佐夫有关万户的观点。符拉基米尔佐夫对万户说明如下（符拉基米尔佐夫.1934，p.135）：

通常，大部落集团组成为万户，即“万人军团”并以其名为名。……由于万户大小不一，而且其中又有一些难于分割的基本单位——鄂托克（otoγ），因此，兀鲁思等同于万户的范围是不稳定的，它们有分有合；旧的消灭之后，新的又代之而起。

或记载如下（符拉基米尔佐夫.1934，pp.133-134）：

总之，鄂托克对和锡袞（qosiyun）的关系，可以说正如兀鲁思对万户的关系。蒙古人民是被区分为鄂托克——和锡袞及兀鲁思——万户的。

据符拉基米尔佐夫解释，这里所说的和锡袞——和锡兀（qosiyu）是指作为社会集团的鄂托克的兵丁（ополжение）所组成的特殊部队，往往与鄂托克互相混用。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由几个鄂托克构成的大部落集团（большая племенная группа）被称

作万户或兀鲁思，其关系正如作为军事集团的和锡袞和作为社会集团的鄂托克的关系。

符拉基米尔佐夫对这些见解提出了几个依据，即关于万户与鄂托克的关系，举出了外喀尔喀被称为七鄂托克的例子（Doloyan otoy）（符拉基米尔佐夫.1934，p.133）；关于万户与兀鲁思的关系，举出了在蒙古编年史中到处都指中期蒙古（特别是东蒙古）为 jirγuyan tümen（六万户）或 jirγuyan ulus（六兀鲁思）的例子（符拉基米尔佐夫.1934，p.132，n.2）。

如在后面的章节也要论述，对于万户由几个分割部分——鄂托克构成这一点没有问题，只是在万户与兀鲁思的关系上存在很多问题。其中就有被符拉基米尔佐夫所忽略的方面。的确，这个时期的万户也被称作兀鲁思。符拉基米尔佐夫除了刚才所举的例子之外没再举例，但在《蒙古源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ulus čin-u Čaqar tümen mayu buyu（难道你的邦国察哈尔万户不好吗？）”这样的记载（《蒙古源流》，库伦本，63r）。另外，不属于六万户的喀喇沁也被称作万户（《蒙古源流》，库伦本，82v）或兀鲁思（比拉.1990，176a）。也可以说，这些例子证实了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观点。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兀鲁思与万户这一用语，其所表达的意思本来不同，并且在很多蒙古编年史中的实际用法也有很大不同。即兀鲁思这一用语一般以 Mongγol ulus（蒙古国）或 Kitad ulus（中国）、Töbed ulus（吐蕃）这样的形式使用（《蒙古源流》，库伦本，96r），而万户则不管是传说的“四十万户蒙古（Döčin tümen Mongγol）”（《蒙古源流》，库伦本，50v），还是指中期蒙古的“六万户（Jirγuyan tümen）”，好像都是作为构成所谓的大蒙古国（Yeke Mongγol ulus）的大集团单位来使用的。这一点还可以通过 Nayan tümen Kitad（八十万户汉人）、Qorin jirγuyan tümen Töbed（二十六万户吐蕃）等例子（《蒙古源流》，库伦本，95r-v）更加明了。

但是，在这里直接对这个时期万户的状态进行研究是有问题的。符拉基米尔佐夫没有任何前提地无视时代的差距，就对这个时期的万户状况进行说明是不对的。这是因为，被称作万户（tümen）的集团在中期蒙古社会中一贯存在，但初期的万户与中叶以后的万户则有很大不同。因此，我们不能将这个时期的万户视为同一万户来进行论述。我想首先弄清这一点。

正如箭内互所指出，在元朝统治下存在很多万户（箭内互.1930，pp.313-315）。不管怎样，中期蒙古的万户肯定在其延长线上。然而，根据后世的蒙古编年史记载称，在此之前有四十万户，将此四十万户与瓦剌（Oyirad）的四万户合并称“四十与四（döčin dörben qoyar）”，以这样的称呼指全蒙古（《蒙古源流》，库伦本，55r、58v）。

只是我们并不清楚其中的“四十万户”具体指哪些。根据蒙古编年史记载，元朝政权被明朝驱逐后，其万户数量减少，到这个时期就成了六万户（《蒙古源流》，库伦本，50r）。这个六万户，是指左翼所属察哈尔（Čaqar）、喀尔喀（Qalq-a）、兀良罕（Uriyangqan）三万户和右翼所属鄂尔多斯（Ordos）、土默特（Tümed）、永谢布（Yöngsiyebü）三万户。这在罗藏丹津《黄金史》（以下简称罗氏《黄金史》）（比拉.1990，167a）以及《大黄金史》等编年史中都有明确的记载（沙斯季娜.1957，pp.96-99）。此外，人们通过一系列的研究也已弄清这一问题（和田清.1959，pp.511-514；霍渥斯.1876，卷1，p.374）。

然而，萨冈彻辰的《蒙古源流》对成为中期蒙古别称的“六万户”与之前的“四十万户”的关系记载，在统治汉地的蒙古政权被明朝驱逐时，四十万户中的三十四万户被截留在汉地，其余六万户则向北出逃，成为了元顺帝妥欢帖木尔乌哈噶图汗（Toγan temür uqayatu qayan）所统治的地方。并记载，中期蒙古的六万户似乎起源于此，好像一开始就已存在一样（《蒙古源流》，库伦本，51v；和田清.1959，p.511）。但是，我们可以很容易察知，

中期蒙古的六万户实际上并非那么简单。因此，该记载不足为信。

对蒙古的统治者来说，丧失汉地领土造成了很大的创伤。其后经过明朝洪武帝、永乐帝的北征，尤其是经过永乐帝的北征后，蒙古受到了决定性的打击，蒙古的统治体制一时濒临崩溃。当然，在这样的政治形势当中，由过去存留下来的很多社会集团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前代所定制度中的万户似乎存续到了很晚。关于这一点，我们通过明朝史料中的片段记载就可以明白。例如，《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四“洪武二十年八月丁丑（三十日）”条记载，在明初屡屡侵入汉地北边的元将纳哈出与元朝宗室成员以及诸多臣下一同来降明朝，其中有“万户、千户、路、府、州、总官、同知等官九百二十七”，可知关乎万户的官人有很多。在《明太宗实录》卷三七“永乐三年九月辛酉（二十九日）”条记载了对“哈里察筹万户古列”等赐宴之事，《明太宗实录》卷六五“永乐七年八月庚申（二十一日）”条记载了“鞑靼太尉万户阿的”等来降之事。其后在《明宣宗实录》卷六六“宣德五年五月乙卯（十六日）”条记载着“瓦剌乞儿吉思之地万户别别儿的”者给明朝遣使之事，《明英宗实录》卷四一“正统三年四月乙卯（二日）”条记载着在亦集乃方面有“伪万户”者二人被捕之事。正统三年（1438年），即自元朝北迁之后已有七十年。元朝的万户长多为达鲁花赤（daruyachi），“万户”相当于副官^①。不管怎样，《明实录》所记载的“万户”是掌管万户（tümen）之官。据此可以认为，当时也依然存留着自古以来的万户。另外，在蒙古，直到很晚的时候仍存留着元朝的统治体制。这也是其很好的证明。在记录蒙古政权向明廷朝贡的《明英宗实录》卷五〇“正统四年正月癸卯（二十四日）”、卷七五“正统六年正月甲子（二十六日）”、卷一〇〇“正统八年正月壬午（二十六日）”、卷一二五“正统十年正月己亥（二十五日）”等条目中，井井有条地记载着拥有过去元朝时期的称号，如

^① 箭内互.1930, p.316。另外，《至元译语》的君官门中有“独满那延”（tümen-ü noyan）的记载（石田千之助.1934, p.2）。

丞相、左丞相、右丞相、知院、大夫、太尉、平章、王、院判、院使、金院、左丞、右丞、断事官、打刺罕、千户，以及其他称号者。

但是，这样拥有从前代继承下来的称号者，自明朝景泰、成化以后明显减少，到了达延汗即位的弘治时期已经很少，其后就完全消失^①。我想，其理由有以下几点：一、在明朝方面的史料中已不再用他们本来拥有的称号，而改用明朝起给他们的称号来记载之处多了起来。二、由于明朝与蒙古之间政治上产生隔阂，已经不再进行朝贡，明朝已不像以前那样了解蒙古内情了。但是，我想比这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瓦剌的也先（Esen）死后在蒙古发生的持续数十年的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即也先即汗位后不久就被部下杀害，其后虽出现几个实力者掌握政权，但他们并不具备决定性的力量，甚至出现了九年汗位空位的现象（和田清.1959, p.326）。由于这种严重的内讧，在成化年间出现了西方穆斯林大酋进攻蒙古的情况（和田清.1959, p.444；田坂兴道.1964, p.1266）。作为大集团的万户也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中受到了影响，过去的万户长也已消失。在其后明朝方面的史料中已完全看不到蒙古的“虏酋”拥有“万户”称号者了。这也似乎在反映上述情况。自元末到15世纪后半叶为止，随着中央权力的衰退出现了旧集团解体与新集团形成的时代。

我们现在在蒙古编年史中看到的万户（tümen）是，在这样的政治混乱一度得到缓和，蒙古在统一的中心人物达延汗统治下成立的六万户。除了其中的几个万户之外，与前代（蒙古帝国、元代）的万户之间的关系已不清楚^②。但是，很多都是在瓦剌的脱

① 即在弘治初年，作为前往明朝的使者有知院桶哈、知院脱罗干等，而其后太师亦不剌、丞相阿尔秃斯等被达延汗清除后，在明朝方面的史料中已经完全看不到这样的称号了。符拉基米尔佐夫称在蒙古文史料中也有这样的现象（符拉基米尔佐夫.1934, p.156）。

② 兀良罕显然与蒙古帝国时期的同名集团有某些联系。另外，和田清（1959.p.507）称，土默特与元代的秃马惕部会有一些联系，但不知其详细情况。在前代史料中很难找到其他很多万户的名字。

欢(Toyān)、也先以及穆斯林大酋等在蒙古掌握实权时再编成的。从那以后,在中期蒙古社会中特有的万户得以发展。因此,在研究万户时有必要在蒙古帝国、元代遗留下来的万户和中期蒙古后半叶的万户之间划清界限。我们所研究的万户是中期蒙古后半叶的万户。在这个前提下,要对前面所介绍的符拉基米尔佐夫有关万户的观点加以研究,则有必要弄清万户在这个时代政治动向中的变化及其构造。

3. 万户与鄂托克的关系

如前所述,万户是由作为社会单位的鄂托克结合构成的。这些万户不仅是固有名称,而且大多是被附以构成它的鄂托克之数来称呼的。蒙古帝国、元朝时期的万户当然没有以这样的形式称呼者。可以说,这个现象是中期蒙古万户的一个特色。因此,要弄清万户这样的形态是何时因何而产生,则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这个时期的万户是以何种形式出现在编年史中的?我想以具体的事实予以论述。《蒙古源流》关于达延汗征服右翼各部记载如下(库伦本,65r):

开战的时候,达延汗降旨说:“……就让十二土默特(Arban qoyar Tümed)与十二鄂托克喀尔喀(Arban qoyar otoy Qalq-a)对阵!庞大的永谢布(Tung yeke Yöngsiyebü)与八鄂托克察哈尔(Naiman otoy Čaqar)对阵。”

关于达延汗的诸子分封记载如下:

阿尔斯博罗特墨尔根琿台吉(Arsu bolad mergen qong tayiji)坐镇七土默特;阿勒楚博罗特(Alču bolad)坐镇内五鄂托克喀尔喀(Tabun otoy Qalq-a);格呼森扎(Geresenje)

坐镇外七鄂托克喀尔喀^①。

此外，在《白史》（Čaγan teūke）中有十二鄂托克鄂尔多斯（Arban qoyar otoy Ordos）（海西希.1959，影印本，1v），在罗氏《黄金史》中有七鄂托克喀喇沁（Doloyan otoy Qaračin）等记载（比拉.1990，167a）。

根据这些编年史的记载可以看出，早在达延汗在位时这样的集团构成已很普遍，但究竟会怎样呢？关于这一点，田中克己（1958年）提出了一个观点，概述如下：

蒙古的编年史记载，在达延汗在位时期，喀尔喀、土默特都是十二鄂托克，在达延汗诸子分封时，喀尔喀被分为内五鄂托克与外七鄂托克，而这些都不是事实。这是因为，这些编年史的记载只不过是现在或者是与此较近时期的事实作为过去的事实溯源记载而已。也就是说，内喀尔喀成为五鄂托克是因为被分封到这里的阿勒楚博罗特之子虎喇哈气（Quraqači）有五个儿子，他们各受封一个鄂托克的缘故。

与此相同，土默特成为十二鄂托克，似乎是在阿勒坦汗统治之后，外喀尔喀成为七鄂托克是在格呼森扎分封其七子之后。

这一看法值得注意，下面对其进行若干探讨。田中论文的主题是有关内喀尔喀五鄂托克，但他在重要问题上只利用了汉文史料，以致理解得不够充分。关于这一点，就像赛瑞斯（1958，pp.158-159）所介绍，在拉西彭楚克（Rasipungsuy）所著《水晶念珠》（Bolor erike）中有详细的记载。该书对喀尔喀五鄂托克的成立记载如下：

赛因大元可汗（Sayin dai yuvan qayan）的第五子亲王阿勒楚博罗特是由叫做阿拉克（Alay）十二库伦（Arban qoyar küriy-e）的喀尔喀分出，坐镇巴林（Bayarin）、扎鲁特（jarud）、

① 海涅什.1966（故宫抄本），p.411。另外，该内容在库伦本（68v）中却记载称，阿尔斯博罗特坐镇五鄂托克喀尔喀，格呼森扎坐镇察哈尔的敖汉、奈曼，这显然是错误的。这一点在故宫抄本里已得到修正。

弘吉喇特（Qonggirad）、伯要特（Bayud）、乌济列特（Üčired、Üjiyed）这五鄂托克喀尔喀。王阿勒楚博罗特只有一子，叫虎喇哈气哈萨尔诺颜（Quraqači qasar noyan）。虎喇哈气哈萨尔诺颜所生乌巴什卫征（Ubaši üijeng）、速巴亥达尔罕（Sobaqai darqan）、乌巴那贝玛多克新（Ubana büime doyšın）、Sonin 岱青（Sonin dayičing）、Šoqai 卓哩克图琿把托尔（Šoqai joriytu qong batur）等五个儿子坐镇五鄂托克。（田清波、柯立甫.1959，III，457a）

与内喀尔喀相关的记载有，《皇明九边考》卷四《宣府镇·边夷考》对嘉靖前半期蒙古中央部的状况记载称，“哈罕部下为营者三，大酋猛可不朗领之”。和田清（1959，p.471）已经指出，这里所说的“哈罕部”就是指内喀尔喀。因此，这个时期的内喀尔喀好像被分为三个集团，其后在虎喇哈气五子分封时成了五鄂托克。那么，何时被虎喇哈气的五子分封的？尚无确凿的证据。只是虎喇哈气的次子速巴亥后来成为了内喀尔喀最大的实力者，屡屡侵犯明朝北边，结果于万历十年被明兵杀死。和田清（1959，p.611）引用《明史》卷二三七“李成梁传”所载“速把亥为辽左患二十年，至是死，帝大喜”的记载指出，速巴亥的活动从嘉靖末年就开始了。他认为，在成为“辽左患”的嘉靖末年，速巴亥在内喀尔喀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因此，虎喇哈气的诸子分封也在此之前早已完成。也就是说，内喀尔喀五鄂托克的成立也在此之前，即在嘉靖后半期、16世纪中叶前后。

外喀尔喀的情况会怎样呢？外喀尔喀一般被记载为七鄂托克或七和锡衮（qosiyun），在清朝史料中也被称作“七固山”^①。

《阿萨拉克齐史》与《大黄史》等外喀尔喀的编年史，以及其他蒙古编年史都记载，坐镇外喀尔喀的达延汗幼子格呼森扎共有七

①《清太宗实录》卷三八“崇德二年八月辛丑（六日）”。

子^①。关于这七子的分封，《大黄史》记载：

格呼森扎死后，大太后母亲（Yeke tayiqu）给其七子分封家产（ömcī）。（沙斯季娜.1957, p.83）

对于此事，噶勒丹（Galdan）的《宝贝念珠》（Erdeni-yin erike）记载：

其后以外七和锡袞（Doloyan qosiyun）为世人所知。

（策·那顺巴拉珠尔.1960, p.88）

据《阿萨拉克齐史》记载，格呼森扎生于“母黑鸡（eme qara takiy-a）年”，即1513年，36岁逝世^②。因此，其卒年应该是1548年。外喀尔喀的诸子分封或许是在这个时候进行的。因此，所谓的七鄂托克喀尔喀应该是在16世纪中叶形成的。

在汉籍史料中，土默特十二鄂托克是作为顺义王的六大部落十二哨或十二部落出现的（和田清.1959, p.710）。据称原本就有七鄂托克。这七鄂托克进入火筛塔布囊（Qosai tabunang）以及阿尔斯博罗特（Arsu bolad）统治之下，最后归阿勒坦汗（Altan qayan）所有，在他统治时期成为了十二鄂托克^③。现在能够看到的蒙古编年史对此没有任何记载。假设在阿勒坦汗在位期间已经成为了十二鄂托克，那么可以认为，那是在其父巴尔斯博罗特济农（Barsu bolad jinong）去世后（《蒙古源流》认为是在辛卯年，即1531年，库伦本，69r），右翼部的统治趋于崩溃，各

① 沙格都尔苏隆、李圣揆.2002, p.69, 影印本, p.271, 48a; 沙斯季娜.1957, p.83。

② 沙格都尔苏隆、李圣揆.2002, p.70, 影印本, p.271, 48b。另据《蒙古源流》记载称，格呼森扎生于壬寅年（1482）（库伦本，66v）。假设他在36岁逝世，那么应该是在1518年，与《阿萨拉克齐史》的记载大不相同。据《大黄史》记载称，格呼森扎的长子阿什海琿台吉生于庚寅年，即1530年（沙斯季娜.1957, p.110），这也与《蒙古源流》的记载不符。很明显，《蒙古源流》有关格呼森扎生年的记载有误。

③ 和田清.1959, p.710。但是，对于土默特部由七鄂托克增加到十二鄂托克这一点有疑问。关于这一点要另文探讨。